

建設人類的共生時代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2020年1月26日

為了紀念創價學會創立九十週年，以及國際創價學會（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簡稱SGI）成立四十五週年，我想就建設一個人人享有尊嚴與安心生活的「可持續地球社會」，發表我的倡議。

首先，我要提及從年初以來，美國與伊朗之間持續著的緊張局勢有所加劇。我強烈敦促雙方繼續努力保持自制，並通過遵守國際法和擴大外交努力，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我真誠希望，在聯合國和其他國家的調解下，能夠找出一條緩和緊張局勢的道路。

我們的世界接連發生極端和具破壞力的氣候異常現象。去年，歐洲、印度和其他地方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浪、超級颱風和暴雨，引發世界各地洪水泛濫成災。澳大利亞大規模森林火災的破壞仍在持續。

正當人們日益擔憂全球暖化的影響不斷升級之際，去年9月於聯合國舉行了氣候行動峰會。在會上，三分之一的聯合國成員國（約65個國家）發表了在2050年前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的方針^[1]。這份努力迫切需要擴大至全球規模。氣候變化並不是一般的環境課題，它威脅著地球上全人類和子孫後代。氣候變化和核武器一樣，左右著人類的命運。

事實上，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所強調，「氣候變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問題」^[2]。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衝擊，有可能使聯合國至今為達致《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而在全球致力消除貧困和饑荒所做的努力，變得毫無意義。

然而，我們的焦點不應僅限於制止氣候問題持續惡化。由於氣候變化的問題無人能夠倖免，為了謀求對策，它有可能成為一個契機，促使全球人類達致前所未有的團結和行動。而我們能否激發這一潛力，其成敗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問題。

此次氣候行動峰會的特點，是由青年主導、要求改革的廣泛行動，同時各國市政府、高等教育機構和私人企業，為應對氣候危機採取了迅速和雄心萬丈的行動。

本月（2020年1月）開始，國際社會試圖全面實施《巴黎協定》，把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攝氏1.5度以內。聯合國在迎接成立七十五週年的一個關鍵任務，就是鼓勵建立積極的反饋循環，通過這個循環，以集體的團結和努力，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同時推動實現所有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在此，我要通過三個觀點，談論形成這種強有力的行動與團結所需的要素。

不讓任何人掉隊

第一個觀點，是決不把在困境中掙扎的人置諸不理。

近年來，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破壞規模日益遽增，其中絕大部分是因異常氣候所引起。無論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都無法倖免受到廣泛影響。例如，去年日本由於颱風「法茜」和「海貝思」的影響，造成猛烈的暴風雨襲擊，引發大規模水災，也使全國大部分地區停電、得不到淨水供應，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這些影響往往集中在本已遭受貧困打擊的社會弱勢群體，如婦女、兒童和老人。這已是日益受到全球關注，也是聯合國一貫重視的問題。這些群體更容易遭遇危險，經歷災難後重建生活也更加困難，因此需要給予適當和持續的支援。

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另一個悲劇，就是越來越多人被迫離開長期居住的家園。太平洋島嶼國家人民所面臨的危機，尤其令人深切關注。由於海平面上升造成土地泛濫成災，導致居民流離失所，很可能成為永久性問題，他們或許永遠都無法重返家園。

本體安全

本體安全是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1991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個人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感受到的秩序感、安全感以及連續性。舉例來說，如果發生的事件不能符合個人認定的生存意義，就會威脅到個人自我認同中的歸屬感以及自信。就這一點而言，社會學家以及心理學家認為人為因素造成的氣候變化會對本體的安全造成威脅。以社會的層面來看，從氣候變化破壞的環境中搬遷出來，會打破人們與家園之間的連續聯繫，並危及物質上、社會中以及文化層面的安全。

我所創立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為要處理這個問題，在兩年前發起一個研究項目，就是研究氣候變化對太平洋島嶼居民的影響。這項研究所強調的其中一點，就是這些居民與自己家園之間具有的特殊聯繫。失去與家園的聯繫，相當於喪失最根本的自我認同。即使這些人搬到另一個島嶼，並獲得物質上的保障，但同時他們會喪失生活在原來島嶼上的安全感，即報告中所稱的「本體安全」。^[3] 該項目的結論闡明，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同時，必須關注這種無法彌補的痛苦。

喪失與家園聯繫的悲痛，常是地震和海嘯等重大災害中難以避免的傷害。這種突然喪失親友和家人的痛苦實在難以忍受。我在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嘯翌年（2012年）所發表的倡言中也強調，社會整體應及時對這種深度的痛苦採取緩衝之計。失去刻畫生命印記的場所及瀰漫日常生活氣息的家園——對於如此難以言喻的痛苦，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1944）如此形容：「早上播下橡樹的種子，下午就想在其樹蔭下乘涼休息，那是不切實際的奢望。」^[4]

在討論氣候變化的影響時，一般傾向把重點放在經濟損失或其他可量化的指標上，但這些宏觀經濟指數未必能反映許多人的實際痛苦。我認為，我們必須同時關注喪失家園的悲痛這一點，並為此共同努力尋求解決方法。

這方面與近年來不斷加劇的貿易摩擦，有著結構性的相似之處。「以鄰為壑」一詞是指通過提高關稅或限制進口來恢復本國經濟的政策。然而，在全球化和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經濟報復的循環往往導致意想不到的後果，即被形容為「玩火自焚」、自陷貧窮的窘境。

貿易摩擦對許多中小型企業的業績產生負面影響，令企業面對壓力而要重整，並使員工失去工作。即使我們承認必須改善如貿易平衡等經濟指標，但使國內外本已蒙受痛苦的弱勢群體生活條件雪上加霜，則只會加劇全球性的社會不穩定。

在去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古特雷斯秘書長描述了他曾訪問各地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包括面對海平面上升，生命隨時被吞噬的南太平洋家庭；夢想能夠返回家園和學校的中東年輕難民；正在努力重建生活的非洲埃博拉倖存者。秘書長發出警戒說，「很多人擔心被傷害、挫敗，也擔心掉隊。」^[5]

我和他有同樣的擔憂。當我們考慮如何解決全球問題時，必須首先聚焦於對人的生命、生計和尊嚴構成的威脅。

氣候與貿易的問題會對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造成深刻的影響。在這方面，我認為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1871-1944）在1903年的著作《人生地理學》中的論點，值得我們關注。牧口會長把軍事衝突的「臨時性」與經濟競爭的「持久性」進行了對比：前者是突然發生，並帶來令人不得不警惕的可怕痛苦；而後者則是漸進式且以溫和的方式發生，以至它不會引起我們的注意。

牧口會長強調，由於人們意識到戰爭具有明顯殘酷的本質，從而通過如談判或調解來防止更大的傷害。經濟競爭的情況則不同，由於是持續且無意識地進行，其結果會被視為「自然選擇」的決定。因此，它逐漸成為生活常態，讓人輕易忽視由此造成的痛苦或非人道事態。

在牧口會長生活的時代，世界受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的蹂躪，一種犧牲他國來滿足自國繁榮的風潮，被視為理所當然。但是，這種心態意味著，人們無可避免地要接受某些部分或群體的犧牲，他們遭受的痛苦與我們無關。這種行為就像一層沉積物或污泥，累積在社會深處。

結果，弱肉強食的經濟競爭毫無節制，應驗了牧口會長的警告，最終造成的痛苦比戰爭來得慘重。^[6] 與牧口會長的時代相比，如今二十一世紀的世界進入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時代，風險也比過去任何時候來得更大。

牧口會長並不否認「競爭」在社會運作中的價值，認為通過相互琢磨，爭相追求卓越，能孕育新的活力和創造力。問題是人們傾向於把世界視為「適者生存」的競技場，認為自己是獨立生活的個體，凡事只考慮自己，完全無視這樣的行為所造成的後果。

牧口會長意識到這個世界是一個「共同生活」的場所。這是他的思想基礎。

以此世界觀為核心，牧口會長在《人生地理學》的緒論中，描述了他的具體感受。當他的妻子無法為新生嬰兒提供母乳時，由於日本國內的奶粉品質欠佳，醫生推薦了一種在瑞士生產的奶粉。牧口會長對在瑞士朱拉山下的牧牛人表示感謝。他還指出，孩子身上穿著用棉布製成的衣服，令他聯想到在酷熱中工作的印度製衣工人。^[7] 通過如此的描述，他又指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一個孩子就與整個世界連繫起來。他將對這些素未謀面的人的感激之情，歸納於「共同生活」這一個詞彙中。這並非一種想像，即使人們常常忽略這個事實，但這才是我們實際生活的世界。

世界是由無數人的重疊與相互交織的活動，以及所產生的影響構成的。不正視這一事實而持續競爭時，我們便會忽視那些遭受嚴重威脅與社會矛盾而受苦的人的存在。因此，「努力保護和改善自己與他人的生活」，應成為我們在社會共同生活與工作時經常持有的自覺。^[8] 這是牧口會長的核心思想。

當前，經濟增長和努力防止全球暖化，兩者間並無抵觸。如2014年起的三年期間，全球經濟年增長率超過3%，^[9] 而溫室氣體二氧化碳（CO₂）的排放量卻保持不變。^[10] 但之後很遺憾地排放量又有所增加。然而，我相信通過「努力保護和改善自己與他人的生活」所作出的明智選擇，如引進可再生能源及改善能源效益等措施，我們應該能夠發展新的經濟模式和生活方式。

我認為，人類追求「共同生活」意識的基礎，是要認同處於嚴重威脅陰影下的人與我們同樣是人，沒有不同。

為此，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阿比吉特·V·班納吉（Abhijit V.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在研究貧困問題與經濟競爭之間的深刻關係時也強調，並非以宏觀經濟角度考慮問題，而是具體地從人民的實際生活狀況進行研究。兩位教授與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於2019年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班納吉與迪弗洛二人合著的《窮人經濟學》一書中指出，世界上被認為最貧困的人，基本上與任何人沒有不同，他們同樣以理性思考。^[11] 對於那些生活在富裕國家的人來說，他們周圍充滿了「無形的助推力」，例如享有安全的食水或醫療制度等，他們已徹底地嵌入這一體系而渾然不覺。^[12] 作者進而指出，窮人不僅過著風險更大的生活，即使遭遇同樣一場災難，對他們造成的傷害可能更大。^[13] 班納吉與迪弗洛提醒人們不要以「刻板印象」判斷人，強調必須了解人們的實際生活。

因此，要理解人並非以社會地位或階級來判斷，而必須從關心他人所處的環境去理解。這也是SGI會員所秉持的佛教核心思想。佛典曾記載釋尊對人的觀察：所有生物之中，雖然各有不同，但人與人之間並不存在區別。人與人之間有所區別的，只是名字而已。^[14]

阿闍世王

阿闍世王（意思是未出生之前已結怨）是印度西北部摩揭陀國國王頻婆娑羅王的兒子以及皇位繼承人。當阿闍世還是王子時，就已經皈依釋迦牟尼的表弟及宿敵提婆達多。頻婆娑羅國王是釋迦的虔誠信徒及施主，提婆達多唆使阿闍世王子殺害他，奪取王位。阿闍世王還多次與提婆達多串通危害釋迦牟尼的性命，但是他後來為自己的惡行感到懺悔，於是尋求釋尊原諒，投入釋尊的門下，並協助釋尊弟子在佛滅後的第一次集結，編纂整理佛陀的教義。

這段話的意思是，雖然社會以族群和名字來區別人，但就人性而言，人與人之間並無任何區別。

釋尊不管對方的社會地位或身份如何，平等地為任何病人提供治療，給予鼓勵，包括路上巧遇患重病的僧侶，或曾策劃置他於死地的阿闍世王。這兩者之間有一共同點：僧侶因為被同伴遺棄，獨自忍受著疾病和孤獨；阿闍世王患有極度重病，令人不敢靠近。釋尊為患病的僧侶洗澡，替他換上乾淨的衣服；即使知道自己生命接近臨終也不惜找時間去見阿闍世王，以佛法的教導耐心引導，幫助他從疾病中恢復健康。

不讓任何人被孤立受苦、不讓任何人獨自面對困境——從釋尊的行動中，我們看見了佛教慈悲精神的原點。從佛法的觀點來看，人的能力並非由先天決定，只不過是以社會固有的觀念來評估人的能力並加以標籤而已。

即使某人發現自己處於困境，如果身邊出現願意與他並肩作戰的同伴，就有可能找到前進的道路。同樣的，當面臨貧窮或疾病時，由於知道擁有同伴的支持，

便能大大改變面對困境時的姿態，這是佛教哲學的核心思想。牧口會長呼籲「有意識地共同生活」的生活方式，即立足於絕不遺棄任何與困難奮鬥的人。

2008年，當發生震動全世界的金融危機時，我與聯合國前副秘書長安瓦爾·K·喬杜里（Anwarul K. Chowdhury）進行了對談。當時我們一致認為，必須最優先去支援面臨嚴峻經濟衝擊的國家和社會弱勢群體。喬杜里前副秘書長強調，需要建立一個全球安全網，以緩衝氣候變化的影響、價格劇烈波動和極端金融緊縮等外部衝擊。^[15]我完全認同他的觀點。我們也一致贊同，聯合國在二十一世紀必須扮演與社會弱勢群體同在的關鍵角色。

2001年，聯合國成立「最不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高級代表辦公室」，喬杜里前副秘書長作為首任高級代表，經常有機會與被國際社會遺棄的國家與人民一起工作，擁有第一手實踐經驗。他曾說，沒有什麼比看見最脆弱國家狀況獲得巨大改善更讓他感到高興的了。^[16]我對此深為感動。

為什麼呢？因為創價學會在草創時期，曾被揶揄為「病人和窮人的團體」。我們通過相互鼓勵，與無數被社會遺棄的平凡庶民一起從不幸的深淵站起來，這是我們感到無比自豪的一段歷史。

戶田城聖（1900-1958）與牧口首任會長共同創立了以庶民運動為根本的「創價學會」，並成為第二任會長。在當時令人憤世嫉俗的社會，戶田會長持續行動，秉持如此的信念：我做我應該做的事情，也就是拯救窮人、病人和正在苦惱的人們，因此我要大聲訴說妙法。^[17]

戶田會長最熱切的願望是從地球上消除「悲慘」二字。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許多國家的人民帶來痛苦，他決心不讓這些苦難重演。在二十世紀兩次全球性衝突之後成立了聯合國，這令戶田會長對聯合國抱有強烈的期待。他呼籲要守護和協助聯合國成為世界的希望要塞。

六十年前（1960年），我就任創價學會第三任會長。同年，我前往美國，訪問了紐約的聯合國總部，為世界和平採取了具體行動，這是為了要實現恩師的夙願。爾後，我們把支持聯合國作為創價學會投入社會建設的核心支柱，並加強與志同道合的人士和民間組織的合作，不斷地為探討解決全球性課題持續行動。

1960年，在我訪問紐約後不久，作為聯合國日（10月24日）慶祝活動之一，應當時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öld, 1905-1961）的提議，在聯合國總部演奏了貝多芬整部《第九交響曲》。過往依照慣例只演奏最終的第四樂章，尤其是那振奮人心的《歡樂頌》大合唱。適逢聯合國成立十五週年之際，首次決定演奏整部《第九交響曲》。

哈馬舍爾德向聽眾致辭時說道，《第九交響曲》一開始，我們就會進入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激烈衝突和黑暗威脅的世界。但是作曲家貝多芬帶領我們勇往直前，在最後樂章的一開始，我們再次聽到各種主旋律反復演奏，那是作為橋樑通往最終的統合。^[18] 將《第九交響曲》樂章的行進與人類歷史相比，哈馬舍爾德滿懷希望地表示，我們一定要堅信，第一樂章出現之後，也總會有第四樂章出現的時候。^[19]

哈馬舍爾德的信念與牧口會長在《人生地理學》中闡述的歷史時代進程不謀而合。在二十世紀初，軍事、政治與經濟競爭的模式，是民眾和社會以犧牲他人來謀求自身安穩和繁榮，這令牧口會長十分關注。令人遺憾的是，這仍然是我們世界現在的實況。

但是，正如《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的合唱一開端唱出：「啊，朋友啊，不是這些音調！」，我們絕對有能力以新的方法，改變根深蒂固的競爭模式。牧口會長提出，實質的變革必須來自他所提倡的「人道主義」或「人道競爭」模式，即為他人的幸福而努力工作的同時，也為自己謀取利益。通過全球一體的團結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我們能夠且必須以這種變革的模式，開闢人類歷史的新領域。

我認為，這項挑戰的核心是承諾「絕不遺棄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通過履行這一承諾，無論身在何處，我們都能將氣候變化這前所未有的危機，轉變為改變時代潮流的契機。

從事建設的挑戰

我要討論的第二個觀點，是共同採取建設性行動的重要性，而不僅停留於傳達共同的危機感。

早在二十世紀80年代，世界已敲響警鐘，警告是人為因素導致全球暖化。1992年5月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是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地球問題首腦會議）之前訂立；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是為減少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2015年12月則通過《巴黎協定》，這是作為包括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首個全球氣候框架。

世界對氣候變化的危機感日益加深，促使一個完整的全球氣候框架應運而生。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進行了一系列科學研究，來協助人們更廣泛地認識氣候暖化的影響，而異常氣象所帶來的威脅，已經是一個明顯的現實。

雖然《巴黎協定》從本月開始運作，但已可預想其未來將面臨的嚴峻挑戰。根據IPCC的特別報告指出，倘若氣候以目前的速度持續暖化，將帶來真正的危機，唯恐最早在2030年，全球平均氣溫的上升幅度將突破攝氏1.5度；^[20]《巴黎協定》的目標就是要將全球暖化控制在這一限度內，所有國家必須立即加緊努力實現這一目標。為此，我們必須超越共同的危機感，提出一個明確的願景，使各地人民能團結一致地積極參與。

如果人們只專注於自身所面臨的威脅，將造成那些自認為沒有受到直接影響的人對威脅漠不關心；即使意識到威脅的嚴重性，也可能被一種無力感所淹沒，最終得出結論：他們感到無能為力，無法改變現狀。

這一點令我想起和平學者埃莉斯·博爾丁（Elise Boulding，1920-2010）博士曾與我分享的一段軼事。1960年代，當她出席一個研究裁軍的會議時，博爾丁博士向與會專家問道：「一旦解除所有武裝，世界將會變得如何？」沒想到所獲的答案使她詫異萬分，他們回答說不知道——他們的工作只是提出如何解除武裝。^[21]根據這一經驗，博爾丁博士意識到，除非人們對「和平社會」有明確和具體的看法，否則幾乎不可能團結起人們，追求和平。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SGI與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簡稱ICAN）合制的「你所珍惜的一切——共創無核武器的世界」展，自2012年以來已在全球約90個城市展出。我們通過此展覽鼓勵大家努力實現和平社會的願景，並為此致力推行廣泛的活動。

一般而言，由於核武器的問題往往使人們聯想到全人類會被毀滅，進而產生強烈的抗拒感，避而不談。相對之下，「你所珍惜的一切」展的首個展板提出反思：對你而言什麼才是最重要？通過引導觀眾去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既能保障自己所珍視的一切，亦能守護他人認為不可替代事物的世界，培養為此採取建設性行動的共同願望。

多年來，一直被認為不可能實現的《禁止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簡稱TPNW），於2017年終於被通過了。這是因為隨著人們對核武器所造成的災難性人道主義後果的關切日益增強，為了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憧憬，人們更致力關注如何禁止核武器。這種強大的勢頭成為一個關鍵因素，推動和團結人使條約通過。

TPNW不僅強調核武器對全人類安全構成的威脅，正如其序言所表明，條約的核心是推動核裁軍，進而建立一個保障人權和倡導性別平等、守護現代與後代人的健康，以及優先考慮生態系統完整性的世界願景。

同樣地，當我們應對氣候變化時，不僅要追求限制平均氣溫上升的數值目標，更必須制定一個想要共同實現的美好世界，積極地向著目標努力採取行動。

在應對建設理想未來的挑戰中，我們找到了第三條前進的道路，可以避免人們陷入以自我為中心的冷漠感，對自身無直接影響的問題不聞不問，或在面對壓倒性的問題時，陷入過度悲觀而感到無能為力。

1992年，SGI配合地球問題首腦會議的舉行，在巴西成立了創價研究所亞馬遜環境研究中心，此後該研究所開展了恢復熱帶雨林和保護其獨特生態的活動。SGI為支持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教育十年」而舉辦「變革的種子」和「希望的種子」展覽，其標題帶來明確的信息：從現在所處之地開始，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潛力成為令全球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建設者；我們的每一個行動都將成為在全世界綻放尊嚴之花的「變革的種子」和「希望的種子」。

面對危機時應採取建設性的做法，強調這種積極態度的根本源自佛教哲學。在體現釋尊教義精髓的佛教經典《法華經》中，闡明「娑婆即寂光」的法理。「娑婆」是梵文sahā的漢語音譯詞，意思是「忍受」或「忍耐」。「娑婆世界」一詞涵括了釋尊的洞察，即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充滿痛苦和苦惱的世界。以這種世界觀為前提，釋尊毅然宣言「我二十九歲出家求善道」^[22]，如此表示他並不感到悲觀，而是認真地去尋求避免人們被痛苦淹沒，獲得幸福生活的方法。

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曾研究釋尊的生平與思想，他感銘釋尊的慈悲而斷言：「佛陀的教導並非一個認識體系，而是救濟的道路」。^[23]

如果人們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充滿苦難的地方，有可能會以錯誤的方式面對世界。例如，人們可能只顧自己擺脫痛苦，當面對社會的嚴酷現實時，即感到無能為力，逃避現實，或者陷入被動，等待他人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釋尊的本意並非指娑婆世界是一個人們受苦的地方，而是要為我們指出，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人們得以實現希望和夢想（寂光土）。這一法理在《法華經·見寶塔品第十一》中有詳細解說：當許多人聚集在娑婆世界聽佛陀說法時，一個巨大、閃耀著尊嚴之光的寶塔在眾人眼前出現，將娑婆世界變為寂光土。

在十三世紀的日本，佛教僧侶日蓮（1222-1282）闡述「娑婆即寂光」為「非去此往彼也」。^[24]換句話說，即人們所渴望的理想鄉並非在遙遠的他方。《法華經》的核心教導，應是更加努力行動，使我們目前所在之處變為璀璨的「寂光土」。

在日蓮的時代，日本陷入近似永無止境的苦難。除了戰亂，人民還遭受地震和颱風等自然災害以及傳染病流行之苦。此外，社會上蔓延著利己主義、逃避現實的思想，或把人類描繪成沒有力量的存在，這種思想形成令人們失去活力的惡性循環。

更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日蓮以《法華經》寶塔出現的一幕，闡述了國土變革的過程。他強調，聚集在會座的人們所看見的寶塔，實際上就是他們「自身」。^[25]他教導我們如何覺醒人內在的潛能，即發現每個人心中存在與寶塔同等尊貴的璀璨光芒，一種能夠照亮這苦難世界之光，也是我們人類無限潛能的源泉。另外，他還強調親手創造自己渴望的世界的重要性，每一個人都要努力像寶塔一樣閃耀光輝，奮力地讓希望之光照亮社會。

2005年2月，我與環保運動家旺加里·馬塔伊（Wangari Maathai，1940-2011）展開對談。馬塔伊博士談論了她如何從自己的周圍環境開始，為世界點燃新希望之光的「綠帶運動」。馬塔伊博士回想該運動從種植七棵樹苗開始，她說：「『未來』並非存在於未來。『未來』是通過我們『現在』的行動而誕生。如果我們想在『未來』實現某些事，我們『現在』就必須採取行動。」

我仍鮮明地記得馬塔伊博士那如沐春風的燦爛笑容。當時日本創價大學的學生用她的母語「基庫尤語」（Kikuyu）合唱「綠帶運動」之歌，熱情迎迓她的到訪。

「這是我們的土地
這是我們的使命
在這裡植樹」

當我看著博士與學生們一同唱和，隨著歌曲節奏搖擺身軀時，我不禁感到眼前这一幕正是從事建設的挑戰所帶來的喜悅。這種從她自身散發出來的喜悅，成為將植樹運動推廣至肯尼亞，甚至擴大到整個非洲大陸的原動力。

值得一提的是我與馬塔伊博士的會面，是在全球首個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框架的公約《京都議定書》生效的兩天後。或許與這歷史性的里程碑相比，馬塔伊博士在肯尼亞發起的運動並不那麼引人注目。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她通過行動激發人類的希望越來越大，並獲得支持，最終發展成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合作的一項運動，而且在她去世後仍繼續推行。通過這項倡議，全世界種植了超過150億棵樹。^[26]此外，在去年舉行的氣候行動峰會上，從巴基斯坦到危地馬拉，世界各國都承諾種植超過110億棵樹。^[27]

我至今仍難忘馬塔伊博士一段銘刻我腦海裡的話語：即使我們認為，一個人的行動或許非常渺小，但試想想，如果將它重複幾百萬次，這將帶來改變。^[28]

她的話語，令人感到一種來自挑戰建設的巨大喜悅。

SGI的「希望的種子」展覽介紹了如馬塔伊博士般發起草根運動的個人實例。另一位介紹的個人實例是未來學家海瑟·亨德森（Hazel Henderson）和她對抗空氣污染的運動。促使馬塔伊博士採取行動的契機，是來自故鄉被視為神聖象徵的無花果樹，由於經濟開發而被砍伐殆盡。對亨德森博士而言，則是當時她居住的紐約市空氣污染嚴重，年幼的女兒從學校回家後皮膚沾滿煤煙灰，促使她投入環境運動。

兩人的出發點都來自內心極度痛苦的經歷，使她們強烈地意識到什麼是最珍貴的、絕不能失去的東西。但她們並沒有因這種痛苦而放棄自己。馬塔伊博士致力於擴大她的運動，決意打破貧窮和饑餓的惡性循環，並通過植樹來孕育和平。同樣地，為了讓孩子再次呼吸到潔淨的空氣，亨德森博士開始與志同道合之士合作。她們兩人都把痛苦轉化為建設的能量，使她們得以實現自己所憧憬的理想世界。

在介紹了這些故事後，作為「希望的種子」展覽總結的展板上，描繪了一棵大樹，樹枝茂盛地向外伸展且長滿許多樹葉。在此，觀眾也受邀一起來思考，從自己所在的地方開始，他們願意展開什麼挑戰，以在世界種植希望的種子。

為了紀念聯合國成立七十五週年，從本月（2020年1月）開始的「UN75」倡議，旨在激發起更多的對話和行動，以明晰我們如何在面對諸多挑戰情況下，建設一個更美好世界。在創造各種不同形態的對話機會的同時，該倡議特別重視接觸那些易於被國際社會忽略的群體，多傾聽他們的希望和恐懼，並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29] UN75的目標是通過即將開展的對話，為2045年聯合國一百週年紀念構建一個全球願景，並為了實現此願景而展開各種合作行動。

由於氣候變化是聯合國在推動對話的核心課題之一，我們必須利用這一機會，關注直接受到深刻衝擊的民眾，理解和關切他們所承受的嚴重恐懼，並通過他們的經歷引發出建設一個更美好世界的積極行動。從直接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人們開始，大多數民眾的觀點，都是我們所期望的未來全球願景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關鍵在於將這些重疊的部分組合起來，創造出一個基於人類實際生活經驗的拼圖。

我相信，通過這些對話產生的共同努力，並擴展這項讓人們彼此聯繫與共享的願景，我們能加速對抗全球暖化的步伐，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全球社會的團結基礎。

青年主導的氣候行動

我要提出的第三個觀點，是努力使今後的十年成為青年為氣候變化採取行動的十年，以配合「聯合國行動十年」於2030年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30]

去年9月，在召開各國首腦氣候行動峰會之前所舉辦的「聯合國青年氣候峰會」，是聯合國以全新姿態的出發，因為它突顯了以下特徵：

- 一、來自逾140個國家和地區的青年，超越各自國家的立場，作為同一世代的成員與會；
- 二、峰會期間各項論壇由青年擔任主持人，而非聯合國官員；
- 三、有別於聯合國會議標準議程以逐個代表輪流發言，峰會以生動地交換意見的方式舉行會議。

更重要的是，古特雷斯聯合國秘書長於開幕式上作為主旨發言聆聽者參加^[31]，專注聆聽青年代表的每一項發言。

2006年，我曾向聯合國提出改革建議，希望每年在聯合國大會的籌備期間，可以先舉行青年代表大會，讓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參加，令世界領導人有機會聽取下一世代的意見。我認為青年氣候峰會正是作為先驅的模範。

此外，「全球氣候罷課」運動在國際社會也為氣候行動造成勢頭與浪潮。於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舉行的僅一週內，在185個國家就有超過760萬人參加了呼籲採取緊急行動應對全球暖化的集會。^[32] 該運動受到瑞典高中生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的啟發，她於2018年夏天開始罷課，要求對氣候危機採取更有力的對應措施。她的行動立即引起了各地青年們的共鳴，也獲得各年齡層人士的支持和參與。

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曾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在巴黎氣候會議上發揮了關鍵作用，目前領導「2020任務」——一個旨在確保《巴黎協定》的目標得以實現的運動。她表示：參加此運動的人們，表示他們的憤怒是有理由的，尤其青年們，他們理解科學，知道氣候變化對自己人生會有什麼影響，也知道氣候變化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33]

她解釋道，青年們知道變革並非不可能，所以他們才對防止全球暖化的緩慢進展表示憤慨。為了向前邁進，她期待今後這種「憤怒」與「樂觀主義」能相輔相成地產生更強大的力量。

菲格雷斯女士於去年2月訪問了日本創價學會本部。她之後在《聖教新聞》撰稿中回顧了讓許多人認為不可能的《巴黎協定》生效的過程。她強調，欠缺樂觀主義就沒有通往勝利之路。^[34] 我不禁感到，當青年對變革現實的熱情和不屈不撓的樂觀主義相融合時，將產生無限的可能性。

青年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已促進世界各地許多人民及團體加速行動。比如在高等教育機構，目前有超過1萬6000所大專院校通過一項宣言，承諾與學生合作解決危機。他們的行動計畫包括：致力於碳中和、為氣候相關研究提供更多資源、在校園及社區加強環境及可持續發展教育。^[35]

另一個例子是動員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地方政府，其中《全球市長氣候與能源盟約》已擴展至138個國家，超過1萬名成員。這些城市都承諾採取積極措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36]

阿根廷學生活動家布魯諾·羅德里格斯（Bruno Rodríguez）在聯合國青年氣候峰會上發言表示，應對氣候變化的年輕變革勇士，正在建立一種新的「集體意識」^[37]；事實上，年輕一代的能量和熱情正在引發一個正面的因果循環。

當目睹這新世代的躍動，令我想起羅馬俱樂部聯合創辦人奧雷利奧·貝恰（Aurelio Peccei，1908-1984）於1981年時曾寫道，要推行公正與民主的道理，就要傾聽青年們的心聲。^[38]

羅馬俱樂部在半個多世紀前已因發出地球及其資源有限的警告而聞名，早已形成了對「可持續性」概念的思考。貝恰博士作為核心人物發揮作用，他強調，必須給予年輕一代更多機會去採取行動，發揮想像力和領導力。從1975年開始，我與貝恰博士曾五次會面，他所強調的觀點至今依然鮮明不變。

傾聽青年的聲音，既不是一個選項，或者是「更好」的選擇。如果我們真正關心未來，這是唯一合乎道理的前進之路，是我們不能略過的一步。這是他不屈的信念。

貝恰博士身為一名企業家，所投身的事業皆獲得豐厚報酬與卓越成就，但最終卻毅然決定放棄一切，創立羅馬俱樂部，是因為他有了深刻的覺悟，即使把所有努力集中於各項事業或計畫，但在推進各項活動的同時，與之相依的母體——即地球的狀況卻一直惡化下去，最終所有努力也可能是徒然。^[39]

出於這種危機感，羅馬俱樂部於1968年成立。然而在成立初期卻沒取得任何顯著的成果。儘管盡了最大的努力提醒人們關注地球所面臨的生存挑戰，但「很多

人猶如聽說是其他星球的問題一樣」毫無反應。更甚的是，即使那些對俱樂部活動的意義表示讚賞的人，也會持著「只要這些活動不侵犯自己的利益或日常活動即可」的心態。^[40]

直到四年後，羅馬俱樂部於1972年出版了報告書《增長的極限》而舉世矚目。這份報告產生了重大影響，即警惕世人關於地球及其天然資源的有限性。然而，仍有許多評論譴責報告的內容過於悲觀。貝恰博士卻不為所動，他始終堅信，重要的是迅速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第一步。^[41]他從未放棄對每個人內在無限潛力的確信。

SGI成立數月後的1975年5月，我與貝恰博士第一次會面。貝恰博士是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向我推薦的人物之一。就在《增長的極限》出版一年後，我於1973年5月在倫敦拜訪了湯因比教授，我們在兩年間進行了約四十小時的對談。之後，湯因比教授希望我能和他的朋友繼續對話，他推薦的其中一位人物便是貝恰博士。

當我們在商討下次訪問歐洲期間能否會晤時，貝恰博士聽說我們將在美國關島舉行第一屆世界和平會議，特別發來了賀電。

1975年1月26日，我在SGI成立日的世界和平會議上，於芳名錄的國籍一欄寫下了「世界」。以SGI日為起點，我想以「世界」二字概括牧口首任會長和戶田第二任會長的精神。牧口會長主張，應自覺世界是世界公民彼此共存的地方，而不僅僅視自己為特定民族或國籍的一員。戶田會長的決心是無論任何國籍，任何人的權利和利益都不應遭到踐踏，他稱之為「地球民族主義」。

四個月後，當我會見貝恰博士時，他手上拿著剛出版的小說《人間革命》的英文譯本，這是我撰述關於牧口和戶田兩位先師創立創價學會的歷史小說。當時，貝恰博士對我們所推進的「人性變革」運動——即通過每一個人覺悟及發揮其內在潛力來變革時代——有著深刻的共鳴。他對此的肯定，在當時對我確實起了莫大的鼓勵。

貝恰博士在與我的對談集《二十一世紀的警鐘》（又名《為時未晚》）中指出：「我們每個人都天生具備這種未開發、未使用過的資源和能力。可以發揮它們的作用去糾正人類正在日益惡化的狀態。」^[42]

現今，世界上眾多青年為氣候危機英勇地挺身而出，這正是貝恰博士所期望看見的青年力量的展現。

在《增長的極限》出版期間，人們所關注的是污染和資源枯竭等問題。如今，造成氣候變化的因素已經與我們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密不可分，使問題更難解決。

循環型經濟

循環型經濟是一種經濟模式，目的在於爭取資源盡可能最長的使用期限，並在使用過程中取得最大的價值，在使用壽命結束時，又能回收及再生產品與材料。循環型系統運用了再利用、分享、修繕、整新、重新製造以及回收等機制，在這個系統中，產生的「廢料」變成投入其他製程的資源。相對於這種再生的方式，傳統的線形經濟奉行的是「取得、製造、丟棄」的製造模式。

在去年10月舉行的歐洲議會上，羅馬俱樂部現任聯合主席桑德琳·迪克森·德克勒夫（Sandrine Dixon-Declève）介紹了羅馬俱樂部的「地球危機計畫」，當中提出向「循環型經濟」轉變所須的十項緊急行動，包括轉向使用低碳能源及擴大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等。^[43]

正因為氣候變化問題如此複雜，需要多角度的應對方式，我們可以將氣候變化的挑戰視為契機，展現人類無限潛能的多元性。在SGI代表參加的青年氣候峰會上，眾多的論壇顯示了其多元化範疇，從環境保護、創業、金融、技術、藝術、體育、時尚、社交媒體及話題性視頻內容等多個角度，以新的構思來找尋解決方案。

這裡，我要強調在青年氣候峰會之後，立即在聯合國通過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首腦會議政治宣言》。此宣言將邁向2030年的十年期間定為「可持續發展落實行動十年」^[44]，並特別提出要和青年建立持久的夥伴關係。

根據這一宣言，古特雷斯聯合國秘書長發起了一個新的「行動十年」，呼籲在全球和社區層面採取行動，並吸引青年參與主流活動。於此，我強力主張以青年為主導，積極去尋找解決氣候危機的辦法。

格蕾塔·通貝里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導者，於上個月（2019年12月）在馬德里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5）上，她在致辭中強調直至2030年這未來十年的重要性，並疾呼：歷史上所有偉大的變革全都是從民眾開始的。無須等待，讓我們從這一刻開始變革。^[45]

為此，我提議每年舉行青年氣候峰會，作為聯合國開闢新軌道的途徑，並建議聯合國與民間社會密切協調，使今後十年成為世界各地青年領導應對氣候變化的期間。

此外，為鞏固這一趨勢，我建議安全理事會採納一項決議，讓青年持續參與相關氣候的決策。這將遵循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2250號決議，敦促成員國加強青年在和平與安全問題中的作用。

今年9月，預定舉行紀念聯合國成立七十五週年的高級別會議。世界的青年應作為主要夥伴受邀參加。上述安理會決議的通過，將標誌著青年主導「行動十年」的開始，也會開啟聯合國歷史的新篇章。

2014年由日本創價學會青年發起的「創價全球行動」，今年作為「創價全球行動2030」（SOKA Global Action 2030）重新啟動，旨在建立一個致力實踐減碳承諾的草根運動，以「我的十大挑戰」來鼓勵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減碳的足跡。

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道路絕非一帆風順，也絕非容易。然而，我深信，只要青年團結一致，就不會有無法打破的僵局。

為TPNW提供支援

接下來，我想針對四個主要領域提出具體建議，以建立一個人人都可以活得尊嚴和安心的可持續全球社會。

第一個是關於《禁止核武器條約》（TPNW）。我要強烈呼籲，必須確保條約在今年，即廣島和長崎原子彈投下七十五週年內生效。這將使2020年成為人類終結核時代的一年。

自2017年7月通過以來，TPNW至今已獲得80個國家簽署、35個國家批准。^[46]為了早日實現使條約生效所需的50個批准國，各國必須加速批准與簽署的步伐。

其中，美國與俄羅斯核裁軍基礎的《蘇聯和美國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簡稱《中導條約》）的失效，將導致核軍備競賽捲土重來。聯合國裁軍研究所主任蕾娜塔·德萬（Renata Dwan）警告說，全球使用核武器的風險，達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水平。^[47]因此迫切需要使TPNW早日生效，以強力扭轉這一趨勢。

目前，沒有任何有核武器國或依附核武器國加入TPNW，但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核武器^[48]的TPNW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體現了以廣島和長崎的「原爆倖存者」（日語「Hibakusha」）為首，世界上受到核武器開發和實驗的受害者的誓言：絕不允許其他人再遭受同樣的痛苦。

數十年來，聯合國接連通過決議，尋求解決核武器問題的方案。首先是194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第一項決議，即是要求消除原子武器。正如古特雷斯秘書長所強調：徹底消除核武器是「聯合國的DNA」。^[49]

放棄核武器計畫的國家

國家	放棄核武器年份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NPT) 立場	說明
阿根廷	1990	1995 (簽署)	放棄製造核武器
白俄羅斯	1991	1993 (簽署)	歸還核武器
巴西	1990	1998 (簽署)	放棄製造核武器
伊拉克	1991	1968 (批准)	放棄核武器計畫
哈薩克斯坦	1991	1994 (簽署)	歸還核武器
利比亞	2003	1968 (批准)	放棄核武器計畫
大韓民國	1970年代中期	1968 (批准)	停止鈾的提煉計畫
南非	1989	1991 (簽署)	拆除核武器庫
瑞典	1960年代	1968 (簽署)	放棄核武器計畫
烏克蘭	1991	1994 (簽署)	歸還核武器

而TPNW的簽署和批准的進度，與五十年前（1970年3月）生效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簡稱NPT）沒有明顯差別。當NPT生效時也只有97個國家簽署和47個國家批准而已。然而，因為NPT的存在，逐步使禁止核武器擴散成為規範。許多國家在考慮核選項時，自願放棄核武器。原本開發並擁有核武器的南非，自願放棄核武器計畫，銷毀並拆除了核武庫，加入NPT行列。

不擴散核武器在NPT生效之前只是處於一種「理想」階段。但一旦條約生效，隨著批准國增多，「理想」就變成「現實」，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正如NPT這一先例所示，即使在最初階段似乎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締約國，但條約的生效具有把世界導向新方向的影響力。

關於建立國際規範的重要性，我想引述兩位TPNW先驅梅拉夫·達坦（Merav Datan）與於爾根·舍弗蘭（Jürgen Scheffran）於1997年起草，並提呈聯合國作為討論文件的《核武器示範公

約》（Model 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簡稱NWC）中所論述的觀點：如果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之間的領域區分，表示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那麼NWC就是把理想成型、將NPT在現實中具體化的條約。TPNW體現了理想與現實這兩方面。由於還未獲得有核武器國的簽署，所以可以說它是理想；但條約的存在本身就是現實。^[50]

他們進一步強調，實際上如果存在反對條約和反對裁軍的勢力，也不會消滅規範本身的價值。^[51] 我對此深表贊同。

因此，今後要全力關注的是TPNW生效後所立定的「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核武器」，任何國家都無法對此提出質疑。

根據國際禁止核武器運動（ICAN）夥伴之一「挪威人民援助組織」2019年的報告，目前有135個國家支持TPNW；^[52] 表示支持TPNW的城市數量也在增加。ICAN於2018年發起的「號召城市活動」（Cities Appeal），除了有核武器國的美國、英國、法國以外，依附核武器國的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意大利、

西班牙、挪威、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以及瑞士的城市也參與其中，當中包括有核武器國的首都華盛頓和巴黎，以及依附核武器國的首都柏林、奧斯陸和坎培拉。^[53]

2019年10月，當局向聯合國提交收錄了1050萬個簽名的《原爆倖存者的呼籲》請願書，其中包括許多有核武器國和依附核武器國的公民。^[54] 由廣島與長崎的原爆倖存者於2016年發起、創價學會和平委員會支持的請願書運動，呼籲所有國家加入TPNW。

禁止核武器條約（TPNW）締約國第一次會議

在《禁止核武器條約》（TPNW）生效後的第一年內，締約國應舉行第一次會議，明訂裁撤本國核武器以及移除外國核武器的最後期限。為了使條約生效，TPNW至少要有50個國家批准。直至2020年1月26日，有80個國家簽署，35個國家批准。條約的支持者建議，締約國應該在第一次會議中考慮，以十年為撤除所有核武器的最後期限。

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結集來自全球不同形式的反核民意，一同果斷地推進禁止核武器，使之成為社會規範。為此，我建議在廣島或長崎舉行「朝向無核武器世界的人民論壇」，落實TPNW締約國第一次會議，以符合條約生效後一年內舉行會議的要求。

論壇將彙集來自世界各地的原爆倖存者、支持TPNW的自治政府和民間社會的代表。提議舉行此論壇的原因，是為了使禁止核武器成為全球人類的規範。辯論的基礎，應該是共同確認使用核武器所帶來的恐怖後果，以及確保這不會發生在任何的國家上。

我真誠希望，日本作為戰時唯一遭受核武器攻擊的國家，將繼續盡力推進核武器非人道性的國際議論，並成為有核武器國與無核武器國之間的溝通橋樑。

突破過去逾七十年來的重重障壁，使TPNW開始談判的突破口，就是從2013年開始召開了三次的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義影響國際會議。通過這些會議闡明了以下的重要觀點：

- 一、任何國家或國際機構，都不可能充分地應對引爆核武器後最初所導致的人道主義緊急事態，並為受影響的人提供足夠的支援；
- 二、引爆核武器所導致的衝擊不會受到國界的限制，它會帶來長久的毀滅性效應，甚至可能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 三、引爆核武器所導致的間接效應，包括阻礙社會與經濟發展，破壞生態系統，而且這些效應會集中在貧窮弱勢群體的身上。

會議的討論觀點從「以核武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轉向「使用核武器如何影響全人類」的立場，從而促使TPNW獲得進一步的談判。

2018年10月，隨著TPNW被通過，負責監督1966年《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執行情況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了一般性意見，指出「核武器的使用與威脅，與尊重生命權利勢不兩立」。^[55]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將「生命的權利」界定為即使在緊急狀況下也「不允許克減的最高權利」^[56]，突出了其在國際人權法中具有獨特地位。這樣就明確了以核武器威脅或使用核武器，就是違反國際人權法的核心權利，這確實是個重大發展。這一點也是我的恩師戶田城聖會長於1957年9月發表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的核心思想。

上文提議的「朝向無核武器世界的人民論壇」的關鍵主題應是「生命的權利」，從國際人權法的觀點，集中討論核武器的非人道性。我也呼籲，論壇可作為人們相互交流的機會，分享禁止核武器後對未來世界的願景。

在制定TPNW時，不曾被視為與核武器問題相關聯的性別觀點，也被納入條約之中。原因是一次辯論中，一位婦女強調女性遭受核武器傷害的情況長期被忽視，其後才納入此觀點。2014年12月在維也納舉行的「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義影響會議」上，核信息和資源服務部門的瑪麗·奧爾森（Mary Olson）明確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核武器的放射性傷害。這促使進一步的討論，最終在TPNW前言中加入以下一文段：

「婦女和男子的平等、充分、有效參與是促進和實現可持續和平與安全的重要因素，並致力於支持和加強婦女對核裁軍的有效參與。」^[57]

這是從性別觀點闡明了通過禁止核武器所創造的未來世界願景。

創價學會多年來整理和發表來自廣島與長崎的原爆倖存者證言集，也收錄了許多婦女的體驗。2016年出版的《婦女們的廣島》，通過14名婦女的證言，描述了她們於原爆後倖存下來所面對的痛苦，如對放射性後遺症的恐懼，以及在生活中不斷遭受與婚姻和生育有關的偏見與歧視。^[58]然而，她們的心意不限於「絕不讓任何人經歷同樣的痛苦」。正如該書的副題所標示——「邁向笑容燦爛的未來」，她們誓願要共同構築一個母子都能安心生活的和平世界。

為了讓TPNW更為普及和增加支持，重要的是必須讓更多人分享彼此在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希望和決心。不只是那些關心和平裁軍的人，更要結集關心性別、

人權問題及家屬子女與未來的人。我深信，當人們廣泛支持並超越國籍與立場的差異，作為全球人類規範力量的TPNW，更具影響力。

核裁軍多邊談判

我要提出的第二個具體建議，是關於使核裁軍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政策。具體來說，我呼籲將兩項協定列入4月和5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NPT締約國審議大會的最終成果報告。第一份協定是開始多邊核裁軍的談判；第二份協定則是商討包括人工智能（AI）和核武器在內的新興技術問題。

關於第一點，我認為有必要延長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簡稱《新裁武條約》），然後就核裁軍展開多邊談判。原定於2021年2月到期的《新裁武條約》框架規定，兩國的戰略核彈頭數量將減至1550枚，並限制已部署的洲際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及其他運載系統等數量至不超過700枚。雖然條約可以延長五年，但目前談判已陷入僵局。

繼《中導條約》被取消後，如果連《新裁武條約》框架也失效，將造成自半個世紀以來兩個大國的核武庫首度失去制衡，以及面臨新的核競賽的風險。此外，小型核彈頭和超音速武器的加速發展，產生了在未來面臨地理限制範圍內的衝突時，將考慮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這使《新裁武條約》有絕對必要延長五年期限。

有鑑於此，NPT審議大會應鼓勵暫停使核武器現代化。締約國應達成一項共識，在2025年下一屆NPT審議大會之前，啟動多邊核裁軍談判。

NPT在過去五十年的歷史中，唯一達成核裁軍框架的只有美國和俄羅斯，多國之間真正核裁軍框架從未實現過。我們必須在2020年審議大會上重申，NPT是所有有核武器國在核裁軍上的共同目標，並承諾要把它達成的唯一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進而採取具體的有效行動。

雖然有各種具體措施可達致目標，但我提議，在將《新裁武條約》延長五年的基礎上，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中國應開始就新的核裁軍條約展開談判，首先著手討論有關核裁軍的核查制度。

借鑒美國和俄羅斯積累的核查經驗，以及五年前在許多國家參與下開始的「核裁軍核查國際夥伴關係」的討論，這五個國家應該開始商討核裁軍的障礙。通過這一對話建立信任，進而推動為削減核武器的數量目標，開始實質性談判。

為了創造多邊核裁軍的條件，我認為重新審視促進冷戰結束的「共同安全保障」觀具有價值。「共同安全保障」是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1927-1986）所領導的委員會為全球安全所撰寫的報告標題。該委員會於1982年6月將報告提交第二屆專門討論裁軍問題的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Second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Devoted to Disarmament，簡稱SSOD II）。報告基於「核戰爭沒有勝利者」這觀點，敦促在意識上進行轉變：「所有國家不能再以犧牲對方來謀求自國的安全。意即只有通過合作才能實現安全。」^[59]我對此想法深有同感。

專門討論裁軍問題的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SSOD）

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之間，和平運動及反核運動增強了力道，推動了核裁軍，也結束了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在這樣的背景中，聯合國大會召開了三次專門討論裁軍問題的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1978年的SSOD I，1982年的SSOD II以及1988年的SSOD III。自1983年開始，池田大作每年發表和平倡言，他以佛教哲學作為基礎，力陳反對核威脅的立場。在這之前，他也向SSOD I和SSOD II提出了建議。在對SSOD II的建議中，他呼籲成立「維護聯合國世界公民議會」，不只是政府，一般人民也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在SSOD II發表的倡言中也談到：「在龐大的核戰力量對峙的情況下，不論怎樣增強軍事力量，也根本不可能確保真正的和平。」^[60]

前一年的1981年，在美蘇關係日趨緊張的情況下，美國總統羅納德·W·里根（Ronald W.Reagan，1911-2004）表明他與蘇聯對立的立場，並暗示有可能發動小規模的核戰爭。里根後來描述了他當時的感受：「我們的政策是基於實力和現實主義，我所希望的是通過實力帶來和平，而不是通過一張紙去決定和平。」^[61]

然而，隨著歐美市民反核運動的高漲，並深刻理解到使用核武器所帶來的毀滅性破壞後，里根強烈地感到絕對不可以發動核戰爭。

他也開始考慮到美國的核競賽對手——蘇聯人民的實際感受。他回顧寫給當時蘇共中央總書記康斯坦丁·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1911-1985）的信函：「在寄給契爾年科的信中，我說我們直接且非公開的書信來往對雙方都有利益。我很努力運用我當演員時純熟地投入感情的技巧。……我進而說我理解到蘇聯有部分人真的對我們美國感到恐懼。」^[62]

通過這樣的溝通，里根以蘇聯人民的感受為對照，實感到自國人民的恐懼。於是他開始尋求與蘇聯領導進行對話，最終於1985年11月在日內瓦峰會上實現了與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首腦會談。戈爾巴喬夫也同樣意識到解決核問題的必要性，他們持續坦率的對話，終於達至共識，並發表聯合聲明：「核戰爭沒有勝者，同時我們絕對不能發起核戰爭。」^[63]

這反映了近似「共同安全保障」的思維，引致美蘇最終於1987年12月簽署了《中導條約》，成為終結冷戰重要的作用。當今，圍繞著核武器的緊張局勢再度

加劇，世界面臨著被稱為「新冷戰」的局面。如今比過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恢復「共同安全保障」的精神，為此，我提議在NPT審議大會的最終文件上，將「核戰爭沒有勝者，同時我們絕對不能發起核戰爭」列入為NPT全締約國的一項宣言。

聯合國於2018年5月發佈的《裁軍議程》呼籲，要實現「為挽救人類的裁軍」^[64]。聯合國裁軍事務副秘書長兼高級代表中滿泉（Izumi Nakamitsu）在報告發表翌日的演說中，如此形容裁軍與安全之間的關係：裁軍是國際和平與國家安全的原動力，為了確保國家安全的有用手段……裁軍不是要追求一種烏托邦似的理想，而是追求如何防止糾紛，在何時何地也要緩和其影響的具體方法。^[65]

通過把核裁軍談判作為實現自身安全的有用手段，我們可以減少其他國家感到的威脅和不安，從而也消除我們自己所感到的威脅和不安。

以這種互利雙贏為基礎，現在正是強力促進NPT第六條款所承諾的誠實履行核裁軍的時候了。

還有一點，我希望在NPT審議大會上達成共識的，就是加深對核武器相關系統的網絡攻擊，及將AI導入此類系統的運作所構成威脅的認知，進而開始商討制定禁止條例。

儘管利用AI、互聯網和其他網絡空間的新技術在許多方面為社會帶來積極的好處，但令人擔憂的是，這些技術在軍事用途中的應用也正在迅速擴展。

去年3月在柏林舉行了一次討論這類新興技術所構成挑戰的會議。來自北約國家、歐盟成員國、俄羅斯、中國、印度、日本和巴西的政府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的主要焦點就是談論被稱為殺手機器人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統（LAWS），以及新的技術為核武器和其他武器所帶來的影響。德國、荷蘭和瑞典的外交部長在會上發表了一項政治聲明，他們一致認為：我們有必要為技術進化的軍事能力如何改變戰爭性質，及其對全球安全的影響達成共識。^[66]

新技術的開發速度驚人，依附核武器國也對此表示關注。因此，我提議在NPT框架內立即就這問題進行商討。

1995年決定將NPT無限期延長時，締約國一致認為，審議大會不僅應評估過去各項承諾的結果，而且應確定今後尋求進一步發展的領域，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67]考慮到核武器與新技術問題的迫切性和風險範疇，我認為這必須是最優先去處理與檢討的問題。

以網絡攻擊為例，不僅會影響核武器的指揮與控制中心，也會影響包括預警、通信和運載系統在內的各種相關系統。在最壞的情況下，對這些系統中的任何一環進行網絡攻擊，都可能導致核武器的發射或爆炸。

關於這個問題，古特雷斯秘書長表達了以下關注：

包括《聯合國憲章》在內的國際法也適用於網絡空間的共識已經存在。但實際上國際法如何適用，同時對於國家在法律的框架內發起惡意的敵對行為時應該如何應對，尚未達到共識。^[68]

作為開創先例的手段，必須在NPT框架內立即採取行動，禁止對核相關系統的網絡攻擊，以減少核風險。

同樣，在核武器系統中引入AI也存在極大危險。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SIPRI）去年5月發表的一份報告，有核武器國引入AI的好處，除了能消除某些限制，例如疲勞和恐懼感，以及隨著時間流逝導致人類體能的下降外，它也能擴大系統的覆蓋範圍，並進入如深海和極地等人類難以執行任務的嚴酷環境。^[69]

但報告也警告說，過於依賴AI將會影響核武器操作的穩定因素，從而增加核風險。以核威懾為例，其本質在於對敵人意圖的心理依賴。^[70] 報告指出，AI最近取得的進展，將使人們不再可能了解敵人的實際意圖。如果AI在核武器系統中發揮主導作用，這些技術的不透明性質——其內部運作難以理解，如黑箱作業一般——將越來越難以預測敵人的意圖，從而令焦慮和猜疑升級。^[71] 報告還指出，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為了研究對方的戰略形態和行動花費了大量時間和努力，雖然對於國防有關代表來說未必有生產性，但最低限度他們仍頻繁地會面。^[72]

當我們談論心理認知之餘，我認為通過雙方經常會面所積累的經驗，實際上提高了雙方預測彼此行動的能力。在冷戰期間，由於錯誤的信息或裝置故障，電腦系統誤傳導彈來襲，引發危急狀態。然而，由於監督系統的人理智地相信他們的直覺，對監視畫面的信息存疑並建議不作反擊，因而得以遏制核危機。在黑客攻擊和網絡詐騙橫行的現今，當我們分析網絡攻擊的相關風險時，加速採用AI將使此類系統更容易受到錯誤和偽造信息的攻擊。

無論依賴AI的核武器系統如何發展，人們應該無法接受由一台機器來主宰核按鈕的最終控制權。然而，眼下必須處理的事實，就是有核武器國爭先將AI引入軍事應用，將給全球社會造成嚴重威脅。雖然使用AI可提高速度並帶來軍事優勢，但也可能導致兩難局面，例如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1917-1963）和蘇共中央總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所面臨的進退兩難局面，如今的應對選項變得更少。

在回顧這個震撼全世界危機的教訓時，肯尼迪曾經說過，有核武器大國，一定要避免強迫對方陷入屈辱地撤退和發動核戰爭之間二者選一的局面。^[73] 這番話反映了當年他們與災難擦身而過的驚險，道出當時情況惡劣的程度。即便如此，當時兩位領導人還有十三天審議的時間。但現時越來越追求速度，令隨時被敵人超越的壓力增加，因此大大減少能夠在深思熟慮的基礎上作出決策的空間。

SIPRI的報告也指出，為了尋求更快、更高智能、更準確和更通用的武器，會導致軍備競賽的不穩定。^[74] 我強烈認為，將AI應用於核武器不但未能防止核戰爭，反而會鼓勵使用核武器進行先發制人的攻擊。

我認為，正如NPT的序言所表明，其精神是承諾竭盡全力避免發生核戰爭的危險。展望未來，所有NPT締約國必須在此基礎上，對網絡攻擊和應用AI的課題進行辯論，同時考慮應否繼續依賴核武器作為安全保障的有效方法。

重視被忽略的群體

我的第三個建議，是有關氣候變化和減少災害風險。

應對氣候變化，不僅限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還迫切需要採取措施，降低極端天氣造成的損害。這也是上個月（2019年12月）在馬德里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5）討論的主題。

根據國際發展和救援非政府組織「樂施會」（Oxfam）在COP25之前發佈的一份報告，過去十年間，與氣候相關的天氣災害增加了五倍。由於氣候變化在全球導致流離失所的人數，遠遠超出受到地震或武裝衝突等災害的人數。^[75]

在此我建議，在日本舉行以氣候變化和減少災害風險為重點的聯合國會議。

自2007年以來，聯合國減少災害風險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簡稱UNDRR）召開了全球減少災害風險平台（Global Platform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簡稱GP），讓各國政府代表和民間社會代表參加，最初每兩年舉行一次，2015年被納入於日本仙台舉行的第三屆聯合國世界減少災害風險大會。最近一次GP2019會議於去年5月在日內瓦舉行，來自182個國家、400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76] GP將每三年舉行一次，下一屆定於2022年舉行。我建議這次會議在日本召開，並集中討論與極端天氣和災後重建有關的減少災害風險事項。

2015年，第三屆聯合國世界減少災害風險大會通過了《仙台減少災害風險框架》（簡稱《仙台框架》）。該框架提出了若干目標，包括至2030年大幅度減少受自然災害影響的人數。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各國需要活用各自的經驗，以便加強措施，減少極端天氣造成的災害風險。

2019年9月，在印度的倡議下，啟動了抗災基礎設施聯盟。這一國際夥伴關係將有助於加強技術支援和能力開發的協調，以發展相關設施，用作抵禦長期受到關注的地震災害，以及氣候變化的影響。近年來經歷了越來越多氣候災害的日本也加入聯盟。我建議日本發揮領導作用，通過與印度及其他成員國協力合作，為GP制定國際指針。

我進一步建議，以地方政府在面對氣候引發災害時所發揮的作用，作為下一屆GP2022的主題之一，讓會議成為各自治政府之間建立夥伴關係的機會。迄今為止，全球已有超過4300個自治政府簽署了UNDRR的「增強城市抗災力」（Making Cities Resilient）運動^[77]，蒙古和孟加拉國的所有自治政府均參與其中。^[78]今年是該運動開始以來的第十個年頭，自治政府當局必須繼續加強相互協調，重視管理極端天氣所引發的風險。

全世界約有40%人口生活在離海岸100公里以內的土地^[79]，這增加了氣候引起災害的風險。絕大多數的日本人也生活在沿海地區。有鑑於此，我認為日本，以及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沿海地區自治政府，可以分享應對氣候變化和減輕災害方面的經驗及有效做法，使亞洲整體能在減輕災害危機方面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應。

今年6月，亞太減少災害風險部長級會議將在澳大利亞舉行。希望在會議上能深入討論加強各自治政府間合作的機會，並透過GP2022會議將之擴大成為一項全球運動。

除了上述主題以外，我希望GP2022會議將優先討論如何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社會，使那些受氣候災害影響最嚴重的人士不至於掉隊。

日內瓦的GP2019會議非常注重促進性別平等和社會包容。半數的小組成員和40%的參與者是婦女，此外還有超過120名殘障人士參加。^[80]SDGs倡導者之一、來自南非的愛德華·恩多普（Edward Ndopu）分享了他對災後復原進程包容性的觀點：殘障人士占全球人口15%，是全世界最大的弱勢群體。然而他們的存在經常被遺忘……（災害時）殘障人士被棄之不理及在日常生活中被排斥，這對殘障人士的現實生活影響有著連帶關係。^[81]

兩歲時被診斷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恩多普強調，有必要重新檢討社會對災後高風險群體的態度。我認為，這一點對任何強化災後復原力韌性所作的努力，是不容忽視的，也是災前風險管理和災後復原的必要條件。只有促進社會「共生」的意識，加強日常生活中的相互聯結，我們才能繼續開發從災難發生到災後復原的能力，以成為守護民眾生命與尊嚴的力量。

GP2019會議上，在減少災害風險和建設復原力如何促進性別平等的環節中強調的重點之一，即是「於災難中把平時被忽略的人們視為可見的存在」的重要性。^[82] 由於許多婦女的日常生活環境常被社會規範和歧視所遮掩，所以當她們一旦真正需要援助時，很可能就會被棄之不理。

當發生極端或不穩定的天氣而需要疏散人們時，婦女往往是最後離開的人。尤其是家中男性在外面工作的時候，婦女們就必須留下來照顧老幼或生病的親屬。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一旦發生災害，許多婦女都會成為支持和照顧社區民眾的一大力量。

聯合國婦女署強調，從災後立即發揮領導力到社區抗災能力的建設，婦女對減少災害風險的實際和潛在貢獻，是一項尚未被開發的重要社會資產。

人們往往受結構因素影響，模糊了真實存在的人或事物。這令我想起大乘佛教經典中一則關於「白晝的星星」的譬喻。儘管天上存在無數的星星，每顆星星都燦爛發光，但在白晝的陽光下，人們卻不察覺它們的存在。

無論是在日常生活還是發生災害時，婦女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當地社區內建立相互支持的網絡。因此，在制定災害管理措施，包括地震和極端天氣災害等的每一步驟，都應該反映婦女的心聲，這將是打造韌性社區的關鍵。

今年2020年是《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通過的二十五週年紀念。在北京舉行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上，為實現性別平等制定了明確的指針。宣言指出，提高婦女地位和實現性別平等是人權問題，也是社會正義的一項條件，因此不能僅僅將其視為婦女問題。這也是建構公正和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唯一途徑。^[83]

在減少災害風險領域，性別平等精神也至關重要。無論是在減少災害風險方面還是在氣候變化造成的極端天氣災害中，加強復原力的措施不僅限於改善硬體基礎設施。因此，我強烈認為，我們不僅必須努力確保性別平等成為現實，而且必須在我們努力建設社區復原力的同時，優先考慮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被忽視和遺棄的人。

多年來，SGI作為一個以信仰為基調的組織，定期參與GP等減少災害風險的國際會議，同時在發生災害期間參與緊急救援和災後重建活動。2017年，SGI於墨西哥坎昆舉辦的GP2017會議上聯合主辦國際論壇，主題為「由以信仰為基調的組織（Faith-Based Organizations，簡稱FBO）主導社區的防災——《仙台框架》的實踐」。SGI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不同宗教的FBO夥伴共同發表聯合聲明^[84]，並在日內瓦舉行的GP2019會議上也繼續發表聯合聲明。^[85]

2018年3月，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SGI與其他四個FBO組織合作成立亞太地區信仰組織聯盟（Asia Pacific Faith-Based Coali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稱APFC）；同年7月，在蒙古烏蘭巴托舉行的亞洲減少災害風險部長級會議上，APFC的五個團體提出了一份包括共同決意的聯合聲明：FBO使命的核心，是消除導致社會脆弱性的根本原因，以及為被社會遺棄的人們送上希望和幸福……以信仰為基調的團體，在防災、增強復原力、推進社區人道主義行動的各方面竭盡其責地在完成任務。^[86]

SGI將與FBO組織分享這精神，繼續致力於加強社會復原力，以建立一個包容性社會為願景，確保所有人的尊嚴都得到維護。

危機中的兒童教育

我的四項建議中的最後一項，是關於加強支持因武裝衝突或自然災害而失去教育機會的兒童與青年們。我認為，守護承擔下一代的兒童與青年的人權和未來發展至為重要，是建立可持續全球社會的基石。

今年9月迎來生效三十週年的《兒童權利公約》，目前擁有196個締約國，比加盟聯合國的國家數目還多，是全世界最為普遍的人權條約。公約規定，政府有義務確保所有兒童的教育權利，事實上，小學學齡兒童失學的比例從公約生效（1990年）的20%左右減至2019年約10%以下。^[87] 儘管取得了顯著進展，生活在遭受衝突和受災國家的數百萬兒童和青年，仍然面臨嚴峻的教育相關問題。

例如長期飽受衝突蹂躪的中東國家也門，約240萬學齡兒童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88] 很多學校設施成為攻擊目標，遭到嚴重破壞，甚至被徵用作為軍事據點或避難所。孟加拉國一再受到氣候惡化加劇的環境災害影響，許多家庭陷入貧困和流離失所。人們擔憂兒童的健康狀況，而且越來越多兒童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

目前，全球有超過1億400萬名兒童和青年因衝突和災害而被剝奪教育機會。^[89] 然而，只有2%的人道主義資金分配額用於教育領域。^[90] 在救濟活動中，教育通常不如生存所需的食物和醫療用品那麼受重視。即使在復原重建階段開始後，教育也一直是人們最後關注的領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簡稱UNICEF）強調，學校作為兒童恢復日常生活的場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學校與同學在一起，能使兒童獲得心理的治療，從來自衝突或災區長大的創傷經歷中復原過來。

世界人道主義首腦會議

2016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了首屆世界人道主義首腦會議，目的在藉由建構一個更廣泛且更多樣的體系，從根本上改革全球的人道救援系統，以期能對當今各種危機做出更有效的回應。首腦會議聚集了來自180個成員國家的超過9000位代表，包括55位國家或政府領導人，數百位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以及以信仰為基調的團體代表，還有來自私人團體和學術界的合作夥伴。

在此背景下，於2016年舉行的世界人道主義首腦會議上，設立了由UNICEF主導的「教育不能等待」（Education Cannot Wait，簡稱ECW）全球基金。這是第一個專門用於支援教育緊急情況和長期危機的基金，至今為超過190萬名陷入緊急人道危機的兒童提供了教育機會。^[91] 教育是遭受危機打擊的青年重要的基礎，能讓他們重拾安全感與希望，並懷抱夢想，繼續走向未來。教育也是為社區和社會帶來和平與穩定的重要資源。

正如ECW教育基金主任亞辛·謝里夫（Yasmine Sherif）指出，如果社會上的市民和難民們，既不能書寫亦不能閱讀，欠缺理論性思辨能力，又沒有教師、律師和醫生，該如何構築一個可發展社會經濟的社會呢？.....教育是促進和平、寬容和互相尊重的鑰匙。讓男女兒童平等接受教育，可以減低暴力與糾紛發生機率的37%。^[92]

SDGs的目標包括確保所有兒童完成優質教育。我們絕不能遺棄生活在衝突或災難國家的兒童與青年，讓他們成為「失落的一代」。

ECW教育基金於2016年成立時，估計每年需要支出85億美元，為受危機影響的大約7500萬名兒童提供基礎教育，相當於每個兒童每年花費113美元。^[93] 如今，需要援助的兒童人數已增至1億400萬。^[94] 其實，只要將每年估計1兆8000億美元的全球軍事開支^[95] 中撥出一小部分，已足以支持全球的教育需求，使生活在惡劣條件下的數百萬青年，能夠邁出充滿希望的一步。

我敦促國際社會鞏固ECW教育基金的財政基礎，以便加強緊急情況下的教育支援。這將對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全球社會作出重大貢獻，保障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和安全地生活。

我敦促國際社會鞏固ECW教育基金的財政基礎，以便加強緊急情況下的教育支援。這將對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全球社會作出重大貢獻，保障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和安全地生活。

我在2009年的《和平倡言》中，呼籲擴大國際合作稅等創新融資機制，以加速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進程。如今要實現其後繼的SDGs更需要加倍努力。此時應該為實現這一目標展開商討，如何通過其他管道籌集更多資金，包括設立一項專門用於教育的國際合作稅。

目前在法國和其他國家實施的機票稅，正作為國際資金的來源，以協助發展中國家患有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等傳染病的病人。創新融資框架的其他例子，包括五年前為防治長期兒童營養不良而設立的「UNITLIFE」。

去年7月舉行的七國集團（G7）發展部長級會議上，擔任創新發展融資領導小組主席的日本，討論了創新融資方法的必要性，例如國際合作稅用於致力開發的領域。日本與UNICEF合作，發動資源向飽受戰爭蹂躪的敘利亞兒童提供援助，包括向10萬名小學生分發教科書和6萬2000名兒童提供學習用品和書包。^[96]

在人道援助不足的阿富汗地區，日本資助了70所學校的建設，使5萬名兒童能夠在適當的環境中學習。^[97]我敦促日本利用其支持海外教育發展的豐富經驗，積極加強ECW教育基金的財政基礎，並帶動討論制定新平台，將更多國際合作資金充作教育基金。

我想分享聯合國難民署的一個事例，顯示當流離失所的家庭能夠在接受庇護的地方獲得教育時，會在兒童與家人心中燃起希望的燈火。一名年輕母親和她的兩個孩子被迫逃離面臨嚴重社會和政治動盪的尼加拉瓜。她決定把兒子和女兒從學校帶走一起到鄰國哥斯達黎加避難。這是令人心痛的決定，但眼前的危機讓她別無選擇。去學校領取孩子的成績冊和證書也需要冒著生命危險，一家人只帶著一個小行李就離開了家園。最令母親擔心的是孩子們在新的國家能否上學。

所幸她發現哥斯達黎加保障所有兒童能接受免費的小學教育。此外，該國北部的許多學校為了方便難民家庭，放寬了入學要求，允准沒有正式證件的兒童進行入學登記。一些學校還為失學已久的兒童提供額外的學習課程，幫助他們追上進度。多虧有了這教育系統，她的兩個孩子才得以繼續接受教育。

她十四歲的兒子表示，對於仍有機會再次學習感到非常高興，並夢想有一天能成為醫生。他每一天牽著十歲的妹妹精神奕奕地上學。正如學校的一位老師說，他的目標是幫助那些被迫離開家園的孩子，能夠在校園內感受到像「在家」一樣。^[98]

由於人道危機而被剝奪受教育機會的1億400萬學齡兒童，這個驚人數字背後的每一個兒童都有各自的人生故事。只要確保這些兒童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就會使他們重新獲得希望，成為他們朝著自己人生目標前進的基礎。

教育、和平、文化——是SGI在192個國家和地區開展社會活動的三大支柱。這些活動旨在促進「民眾的、由民眾發起的、為民眾的自強運動」。

象徵這SGI運動的精神源流，刊印在九十年前（1930年11月18日）出版的《創價教育學體系》封面設計。那是創價學會兩位會長——牧口常三郎與戶田城聖，這兩位教育家的師弟精神結晶。封面插圖描繪了一盞油燈，其光線驅散了四周的黑暗。

當社會處於動盪或充滿威脅時，最先受到衝擊的是兒童和青年。牧口會長親眼目睹這樣的情況，深感痛心。他全身心投入教育最前線的小學教育，全力以赴地點燃兒童心中的希望之光，同時不斷探討能夠使人們擁有創造幸福能力的人本教育模式。牧口會長的心血結晶就是《創價教育學體系》這本曠世著作。

牧口會長三十多歲時，正值日俄戰爭爆發期間（1904-1905），他致力於促進當時在日本普遍落後的女性教育。許多家庭在經濟上舉步維艱，往往因戰爭而死亡、受傷或生病而失去主要養家糊口的人。他通過學費援助計畫，幫助這些家庭的學生得到全額資助，或者減免50%的學費。

四十多歲時，他在一所專為貧困家庭設立的小學擔任校長。期間，他拜訪並幫助照顧患病的兒童，也為營養不良的兒童安排學校餐點。牧口會長之所以竭盡全力支援學生，是因為他也曾經歷因家庭環境而被剝奪受教育的機會。

1923年關東大地震摧毀了東京地區，當時牧口會長五十多歲。許多兒童被迫搬遷到新學校，牧口會長就在他當校長的學校熱烈歡迎他們，並為兒童提供必要的學習用品。他也關心教過的學生們的健康和處境，親自走訪曾執教過的學校的社區，一一確認他們的安全。

同樣，作為牧口會長的弟子，戶田會長不顧戰時的限制，在1940年至1942年期間出版了35期兒童教育雜誌。戶田會長對兒童的幸福和福祉的真誠願望從未減弱，就算他與牧口會長一起被控違反軍政府的思想統制而入獄。牧口會長更在獄中殉教。

兩年的牢獄生活，沒有摧毀戶田會長的信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個月，他獲釋出獄，第一步就是為兒童開辦函授課程。由於許多學校在戰後的混亂中無法運作，戶田會長努力確保教育機會得以延續下去。

從創價學會的歷史得以證明，兩位會長心中，脈動著「對於處於任何情況的兒童們，也要繼續燃點他們心中的教育燈火」的信念。《創價教育學體系》的出版日期即是創價學會的創立日，我相信，封面上的油燈插圖，體現了兩位會長對教育的信誓與行動。如油燈所隱喻，教育的火焰需要有人支撐才不會熄滅。只要有傾注熱情的人們以及給予支持的社會，教育之光必定能夠持續發亮。

我繼承了先師牧口會長和戶田會長的火炬，在各國建立了教育機構網絡，包括東京和大阪的創價初中和高中、日本創價大學和美國創價大學，以及巴西的創價學園。逾半個世紀內，我也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進行對話，竭盡所能建立一個「為教育的社會」、一個確保兒童從現在以至未來都能享有尊嚴與幸福的社會。

SGI今後會繼續呼籲「為教育的社會」的重要性，並努力提高人們對此的意識。同時致力於促進「民眾的、由民眾發起的、為民眾的自強運動」，以不斷擴大的全球團結力量，應對氣候危機和其他挑戰。

腳注：

- [1] 聯合國2019年氣候行動峰會閉幕新聞稿。聯合國氣候行動網站。
- [2] 安東尼奧·古特雷斯。關於氣候變化的評論（Remarks on Climate Change）。聯合國秘書長網站。2018年9月10日。
- [3] 約翰·R·坎貝爾。大洋洲的氣候變化、移徙和土地（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and Land in Oceania），4頁。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
- [4] 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里。風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s）。27頁。
- [5] 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秘書長在聯合國大會第七十四屆會議上的發言。聯合國秘書長網站。2019年9月24日。
- [6] 牧口常三郎。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二卷）。397頁。
- [7] 同上，第一卷。13頁。
- [8] 同注6。399頁。
- [9] 實際GDP增長（Real GDP Growth）。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網站。
- [10] 穩定三年後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將上升（Glob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Set to Rise After Three Stable Years）。未來地球網站。2017年11月13日。
- [11] 阿比吉特·V·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窮人經濟學：徹底反思如何對抗全球貧窮（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ix頁。
- [12] 同上，70頁。
- [13] 同上，138頁。
- [14] 中村元。佛陀的話語（ブツダのことば）。135-136頁。
- [15] 池田大作、安瓦爾·K·喬杜里。創造新地球社會——暢談和平文化與聯合國。208頁。
- [16] 同上，221頁。
- [17] 戶田城聖。戶田城聖全集（第四卷）。62頁。
- [18] 達格·哈馬舍爾德。聯合國日音樂會的致辭（Remarks at United Nations Day Concert）。聯合國網站。1960年10月24日。
- [19] 同上。

- [20] **特別報告：全球暖化攝氏1.5度決策者的摘要** (Special Report: Global Warming of 1.5°C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網站。
- [21] 池田大作、埃莉斯·博爾丁。**讓和平文化之花盛開** (Into Full Flower: Making Peace Cultures Happen) 。92頁。
- [22] 中村元。**釋尊的一生** (釈尊の生涯) 。57頁。
- [23] 卡爾·雅斯貝爾斯。**蘇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穌：大哲學家** (Socrates, Buddha, Confucius, Jesus: The Paradigmatic Individuals) 。26頁。
- [24]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御義口傳，815頁。
- [25] 同上，773頁。
- [26] **一萬億棵樹運動** (Trillion Tree Campaign) 。地球植林計畫網站。
- [27] 安東尼奧·古特雷斯。**氣候行動峰會閉幕辭** (Remarks at Closing of Climate Action Summit) 。聯合國秘書長網站。2019年9月23日。
- [28] 瑪麗安·施納爾。**與馬塔伊對話** (Conversation with Wangari Maathai) 。女權主義者網站。2008年12月9日。
- [29] **聯合國在成立七十五週年的2020年就世界的未來進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全球對話** (UN to Launch Biggest-ever Global Conversation on the World's Future to Mark Its 75th Anniversary in 2020) 。聯合國網站。2019年10月24日。
- [30] 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就聯合國秘書長在2020年優先處理的課題於聯合國大會發表的致辭** (Remarks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Secretary-General's Priorities for 2020) 。聯合國秘書長網站。2020年1月22日。
- [31] **於聯合國，青年活動家要求各國領導人對氣候緊急狀態立即採取行動** (At UN, Youth Activists Press for Bold Action on Climate Emergency, Vow to Hold Leaders Accountable at the Ballot Box) 。聯合國新聞網站。2019年9月21日。
- [32] **氣候罷工後760萬人呼籲緊急行動** (7.6 Million People Demand Action After Week of Climate Strikes) 。全球氣候罷工網站。2019年9月28日。
- [33] 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談氣候變化：「零碳是我們的唯一選擇」 (Christiana Figueres on Climate Change: 'Net Zero Carbon is Our Only Option') 。科學焦點網站。2019年10月2日。
- [34] 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脫碳的五原則** (脱炭素化への五つの原則) (2019年4月4日) 。**聖教新聞**，第2版。
- [35] **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發出氣候危急宣言** (Higher and Furt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cross the Globe Declare Climate Emergency)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網站。2019年7月10日。
- [36] **關於我們** (About Us) 。全球市長氣候與能源盟約網站。
- [37] 同注31。
- [38] 奧雷利奧·貝恰。**留給未來的一百頁：羅馬俱樂部主席的思考** (One Hundred Pages for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lub of Rome) 。178頁。
- [39] 奧雷利奧·貝恰。**人的素質** (The Human Quality) 。13頁。
- [40] 同上，67頁。
- [41] 同上，101頁。
- [42] 池田大作、奧雷利奧·貝恰。**二十一世紀的警鐘**。164頁。
- [43] **地球應急方案：為了人類、自然和氣候確保新政策** (Planetary Emergency Plan: Securing a New Deal for People, Nature and Climate) ，7頁。羅馬俱樂部、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

- [44] 大會主持召開的可持續發展高級別政治論壇政治宣言。聯合國大會。
- [45] 格蕾塔·通貝里。格蕾塔·通貝里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上的演講全文 (Greta Thunberg UN speech at COP25 in Full)。每日快報網站。2019年12月11日。
- [46] 條款現況 (Status of Treaties)。聯合國條約集。
- [47] 聯合國裁軍研究所主任表明，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現在核戰的風險最高 (Risk of Nuclear War Now Highest Since WW2, UN Arms Research Chief Says)。路透社網站。2019年5月22日。
- [48] 禁止核武器條約，1頁。聯合國大會。
- [49] 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日內瓦大學就啟動裁軍議程發表講話 (Remarks at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on the Launch of the Disarmament Agenda)。聯合國秘書長網站。2018年5月24日。
- [50] 梅拉夫·達坦、於爾根·舍弗蘭。瓶子外的威脅：核裁軍的威力與邏輯 (The Treaty is Out of the Bottle: The Power and Logic of Nuclear Disarmament)。130頁。
- [51] 同上。
- [52] 2019年禁止核武器監測報告：跟進如何朝向無核武世界 (Nuclear Weapons Ban Monitor 2019: Tracking Progress towards a World Free of Nuclear Weapons)，4頁。挪威人民援助組織。
- [53] ICAN號召城市活動 (ICAN Cities Appeal)。國際禁止核武器運動網站。
- [54] 原爆倖存者的呼籲：超過1050萬人簽署支持廢除核武器 ('Appeal of the Hibakusha': More Than 10.5 Million Signatures Supporting Call for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聯合國裁軍事務廳網站。2019年10月18日。
- [55]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項一般評論第36 (2018)，有關生命的權利 (General Comment No. 36 (2018) on Article 6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right to life)，第66段。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 [56] 同上，第2段。
- [57] 同注48，3頁。
- [58] 創價學會青年部。廣島與長崎：我們不會忘記 (Hiroshima and Nagasaki: That We Never Forget)。
- [59] 裁軍與安全問題獨立委員會。共同安全報告：生存的藍圖 (Common Security: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139頁。
- [60] 池田大作。池田大作全集 (第一卷)。102頁。
- [61] 羅納德·W·里根。美國生活：里根自傳 (An American Life: The Autobiography)。267頁。
- [62] 同上，595頁。
- [63] 於日內瓦峰會發表的美蘇聯合聲明 (Joint Soviet-United States Statement on the Summit Meeting in Geneva)。美國總統計畫網站。1985年11月1日。
- [64] 安東尼奧·古特雷斯。保護我們的共同未來：裁軍議程 (Securing Our Common Future: An Agenda for Disarmament)。聯合國裁軍事務廳。
- [65] 中滿泉。第二屆禁核試條約科學與外交研討會高級別會議 主題演講 (Second 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Science Diplomacy Symposium, High Level Session: Keynote Speech)。聯合國裁軍事務廳。
- [66] 政治宣言：會議「2019年 掌握技術，反思軍備控制」 (Political Declaration: Conference "2019. Capturing Technology. Rethinking Arms Control")。德國聯邦外交部辦事處網站。2019年3月15日。
- [67] 強化審查條約程式：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Strengthening the Review Process for the Treaty: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聯合國大會。
- [68] 同注49。

- [69] **人工智能對戰略穩定與核風險的影響，第一卷：歐洲大西洋的展望**（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Nuclear Risk, Volume 1: Euro-Atlantic Perspectives），23頁。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 [70] 同上，95頁。
- [71] 同上，19-20頁。
- [72] 同上，51頁。
- [73] 約翰·F·肯尼迪。**華盛頓美利堅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說**（Commencement Addres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約翰·F·肯尼迪總統資料庫、博物館網站。1963年6月10日。
- [74] 同注69，121頁。
- [75] **氣候所引發的災難每年令全球超過2000萬人被迫離開家園，流離失所**（Climate Fuelled Disasters Number One Driver of Internal Displacement Globally Forcing More Than 20 Million People a Year from Their Homes）。國際樂施會網站。2019年12月2日。
- [76] **第六屆全球減少災害風險平台摘要**（Summary of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Global Platform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網站。2019年5月20日。
- [77] **增強城市抗災力：我的城市有備無患**（Making Cities Resilient: My City is Getting Ready）。聯合國減少災害風險辦公室網站。
- [78] **孟加拉國全體參與城市運動**（Bangladesh Joins Cities Campaign En Masse）。聯合國減少災害風險辦公室網站。2018年7月2日。
- [79] **概況介紹：人民與海洋**（Factsheet: People and Oceans）。聯合國海洋大會。
- [80] 同上76。
- [81] 全球減災和災後恢復基金（2019年5月31日）。**世界重建大會：殘疾人士災後恢復**（WRC4: Disaster Recovery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 [82] **提升婦女對於減少災害風險與復原力的領導能力**（Promoting Women’s Leadership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Resilience）。聯合國婦女署網站。2019年5月31日。
- [83] **《北京宣言》與《行動綱要》**（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聯合國婦女署。
- [84] **以信仰為基調的組織致GP2017的公共聯合聲明**（Public Joint Statement of 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to GP2017）。全球減少災害風險平台。
- [85] **以信仰為基調的組織致全球減少災害風險平台的聯合聲明**（Joint Faith Based Organizations’ (FBOs) Statement for the Global Platform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GPDRR)）。行動聯盟及其他。
- [86] **以信仰為基調的組織致亞洲減少災害風險部長級會議的聯合聲明**（Joint Faith Based Organizations’ (FBOs) Statement for the Asian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亞太地區信仰組織聯盟。
- [87] **為每一個兒童爭取他們的權利：有關兒童的權利大會**（For Every Child, Every Right: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t a Crossroads），7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 [88] **也門返校計畫**（Going Back to School in Yemen）。全球教育夥伴關係組織秘書處網站。2019年1月7日。
- [89] **三分之一居住在受戰爭或自然災害影響的國家的兒童和青少年失學—聯合國兒童基金會**（1 in 3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s Out of School in Countries Affected by War or Natural Disasters - 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網站。2018年9月18日。
- [90] **7500萬受危機影響的兒童急需教育支援**（75 Million Crisis-affected Children are in Urgent Need of Education Support）。教育不能等待網站。
- [91] **成果報告**（Results Dashboard）。教育不能等待網站。2019年12月3日。

- [92] **世界性人道主義危機的蔓延導致數以百萬計的兒童無法接受教育**（World's Spreading Humanitarian Crises Leave Millions of Children Without Schools or Education）。國際通訊社網站。2019年10月24日。
- [93] 同上。
- [94] 同上89。
- [95] **世界軍事支出在2018年增至1兆8000億美元**（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Grows to \$1.8 Trillion in 2018）。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網站。2019年4月29日。
- [96] **政府開發援助 為萬名兒童提供高質量教育：日本的措施**（政府開發援助 万人のための質の高い教育：日本の取組）。日本外交部網站。2016年8月9日。
- [97] 同上。
- [98] **哥斯達黎加學校向尼加拉瓜的流離失所兒童敞開大門**（Costa Rican Schools Open Their Doors to Displaced Nicaraguan Children）。聯合國難民署網站。2019年7月5日。